

上海市传播学重点学科资助



许正林 著

# 传播理念的 核心与边界

CHUANBO LINIAN DE HEXIN YU BIANJIE

上海三联书店



许正林 著

# 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

CHUANBO LINIAN DE HEXIN YU BIANJIE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 / 许正林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6

ISBN 978 - 7 - 5426 - 3041 - 4

I. 传… II. 许… III. 新闻学: 传播学—研究  
IV.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91 号

## 传播理念的核心与边界

---

---

著 者 / 许正林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1.75

---

**ISBN 978 - 7 - 5426 - 3041 - 4/C · 310**

定价: 44.00 元

# 目 录

## 1 传播理念的核心问题

- 3 思想史的写法:欧洲传播思想史绪论
- 27 西方表达自由观念的演变及其界碑
- 50 马克思传播思想中的四个核心观念
- 65 麦奎尔大众传播思想的两个核心观念

## 75 大众传播社会角色

- 77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障碍与应对策略探讨
- 86 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大众媒介角色
- 95 危机传播中的传媒功能与政府对策
- 101 公共广播电视的受众观透视

## 109 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务

- 111 重写新闻史:中国新闻史理念的确立与创新
- 130 新闻编辑理论·范式的确立及其演进
- 140 当前西方报纸版面编辑价值取向分析
- 158 我国城市教育电视台的困境与出路
- 164 解读上海东方卫视
- 173 上海报业现状与发展态势探析
- 183 上海与首尔报业比较分析
- 189 上海都市报广告市场分析
- 204 我国报纸艾滋病报道 18 年历程与价值取向演变分析
- 215 浅析当前经济新闻报道中的四种不平衡现象
- 223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广播事业情况补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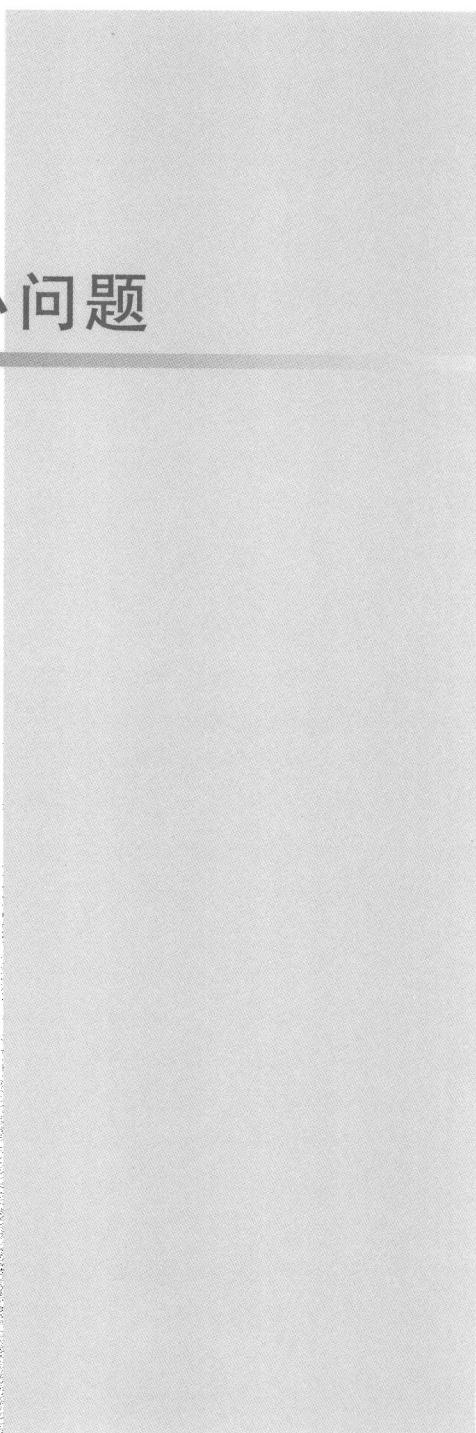
## 237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 239 传播学视角:明清之际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再考察
- 254 跨文化传播视角: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中学西传
- 264 从宗教传播到文化传播:传教士报刊观念及其影响
- 281 当代世界宗教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透视

## 291 体育传播与广告研究

- 293 体育传播学: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
- 309 新时期体育新闻研究的理论视野
- 319 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广告业发展对策分析
- 330 广告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与实践价值探讨
- 340 后记

## 传播理念的核心问题





# 思想史的写法：欧洲传播思想史绪论

## 思想史概念

在西方学术史中，“思想史”有多种表述，一般称“Intellectual history”，如拉凯普莱和卡普兰(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的《现代欧洲思想史》为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也可以称 history of thought，如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为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还可以称 history of ideas，如詹姆斯(Preston E. James)的《地理学思想史》为 *All Possible Worlds-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等。“Intellectual”侧重于指知识精神；“thought”侧重于指某一时代、某一领域的思想；ideas 则侧重于指观念，所以思想史又可以称为观念史。观念史这一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雅克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等人的历史学观念，到 20 世纪阿瑟·诺夫乔伊教授将思想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

虽然诺夫乔伊教授反对把对思想的历史研究分解为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等，并提出进行一种学科间的探讨，但并未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一般认为，观念史介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而比文化史要窄。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精英思想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文化史通常还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对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的加工和提炼及其表达。

那么，思想史与观念史区别在哪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与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

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罗杰·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思想样式。<sup>①</sup>这些区别的表述中,事实上暗含着对思想与观念的界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什么是思想?杜兰特先生说:“这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思想包含了一切,而只有通过这‘一切’,思想才能得到界定。思想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事物,但也是人类最终极的秘密。我们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人类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sup>②</sup>也就是说,人类所有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精神文化都是思想。

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被认为是第一个赋予“思想”这个词专门意义的人,卡莱尔的意思是,“思想”是一个“理智和精神的有机体”,是外部水平的内核和动力。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史家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一书的导论中全面讨论了思想。梅尔茨认为,思想是隐蔽的世界,在他看来,“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只有当事实和事件不再互不相连,只有当它们在我们看来按照某种设计和目的联结在一起,把我们带回到某处原始的原因或者向前引到某个确定的终点时,我们才能从历史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获得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在外部事件下面的或者与之相伴隨的隐蔽动机、欲望和活力也是如此,在我们能把握和记载它们之前,先得使它们取得某种联系,使它们处于某种秩序和连贯之中。隐蔽的思想元素是这样的东西,它使事实和事件可以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并加以评论,它成为它们的基础并把它们连接起来,它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复现而展示给我们”。<sup>③</sup>简言之,思想这种东西指我们与历史建立的一种联系,和描述的历史上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认定的这种联系的某种有序性,所以,思想的本质就是指一种历史的复现,对纷繁世界的论断。

<sup>①</sup> 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7页。

<sup>②</sup> 威尔·杜兰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王琴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sup>③</sup>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梅尔茨认为，“思想是不能定义的”。在他看来，许多人可能要求给思想下一个定义，或者给自然界、生活和思想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一比较精确的陈述，这种定义必须留给读者自己去下。他说：“在拒绝给我所说的思想下定义上，我采取的观点同马克斯·米勒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思想科学》<sup>①</sup>中所持的观点相对立，他在那里说：‘我说的思想是指思维活动，而我所说的思维无非就是指结合，我并不妄想说，其他人无权在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义上使用思想，只要他们清晰地加以定义。’就这位历史学家的这部著作的一部分是定义而言，我坚信，这是他作记叙的结果和产物。读者细心研读过这部著作后，就会留下这种印象。历史主要不是一门通过分析来搞的科学；历史试图把浩瀚的细节收集起来安排成一幅生动图景。像过分写实的明显一条那样的过分严格的定义会损害总体效果。”<sup>②</sup>事实上，在此后的叙述中，梅尔茨仍不自觉地暧昧地界定了“思想”这一概念：“‘思想’语词在我看来能作极其广泛的应用，即用来按照最普泛的精神标示这一切现代志向的共同目标和努力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具有真理性和价值的东西。”<sup>③</sup>最简单地说，思想是一种精神产物，是一种判断的概括。

思想有多种意义，梅尔茨认为，“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欲望、冲动、感情和想象构成的大区域，而我们应当承认，它们全都在灵魂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sup>④</sup>

对于思想品格的意义，历代思想家都非常看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的思想。”<sup>⑤</sup>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精髓就是思想，历史阶段之间的连接物也是思想，也正是在历史流变的长河中显示思想的继承性。所以黑格尔说：“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高点便是它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状况已经获有一个思想——它已经将它的法律、正义、道德归合为科学，因为在这样（客观的和主观的）统一里含有‘精神’自身所达到的最深切的统一。”<sup>⑥</sup>就是说，思想就是民族，也是人类所有精神产品的凝聚与关联性，它们常常包含在法律、正义、道德等形式中。

“观念”（idea）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译为“理念”，“观念”一词也最早来自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事物都有个理念（eidos；idea），它是事物的“型”，决定着事物的本质。柏拉图关于现实的本质这个最卓越的理论就是其著名的观念（或形态）

<sup>①</sup> Marks Mill, *The Science of Thought*, London, 1887, p. 1.

<sup>②</sup>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sup>③</sup> 同上，第30页。

<sup>④</sup> 同上，第7页。

<sup>⑤</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sup>⑥</sup> 同上。

理论，在这个理论里，他看到位于物质对象的动态世界背后的一个不变的完美的永恒的形态范畴。观念的这个概念引发其对于唯心论的起源进行思考。柏拉图认为，只有依靠智力，人们才能了解观念或形态。不过，现实事物与理念是有差距的，因为客观事物总是难以充分实现理念。因此，可以说，观念就是我们极尽想象的产物，是想象出来的用来衡量事物的尺度，想象一种东西，总是往完美里去想，想得眼花缭乱的，所以，观念就同时是理想——从 idea 到 ideal 的语言学演变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基本上是精神上的或非物质的——仅仅是一种观念。这个物质世界就像映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一样，只是对于现实的歪曲和错误的反映。因此，个体的人不是真实的，而实际上是很多表现形式中相同的一种形式或观念。后来洛克和贝克莱也使用“观念”来表示感官印象或感官材料。

观念就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的基本要素，是思想的分子，它构成思想的海洋，观念促成思想形成与发展，当观念在一个思想者、或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形成体系时，就构成了思想。而观念总是不系统的，杂乱的，所以，诺夫乔伊说：“观念史因而不是那种具有高度专门化思想的不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一个思想被专门化的时代中，观念史的研究有某些困难。”“哲学史以及关于人类所有各个方面反思的历史，大部分是观念混淆的历史。”因此，他说，“观念史是一个试错(trial-and-error)的历史”。<sup>①</sup>

观念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困难的，对此诺夫乔伊进行了严格的辨识。首先在于某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某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正是这些如此理所当然的信念，它们宁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也不要正式地被表述加以论证，这些看似如此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方法，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sup>②</sup> 这是所谓思想习惯，是指那些在某一时代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的、潜在的逻辑设定，或未能意识到的思维定式。也就是被认定为存在于人们心中而没有被明确表述出的东西。其次是某些特有假定或理智的习惯。这种理智习惯总是让人们本能地倾向于把所有一般概念的意义归结为那些属于这类概念的具体可见的特殊事物的枚举。再次是，观念史要研究的还有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存在于被早期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所明白阐释的某种单一特殊的命题或原则之中，以及和那些作

<sup>①</sup>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sup>②</sup> 参见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序。

为或曾被设想为它的推论的进一步的命题处在一起”。<sup>①</sup> 这些观念和这些原则紧密相连，只有弄清了它们，才能对与之相对的命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思想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性。正是有人类的思想，才有了人类的文明史。所以何兆武先生在讨论思想史时，是与文明史相联系的。何先生认为，“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和其他物种一样单纯的自然史。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历史。都是由于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为行动的历史。思想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历史以生命和生机，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思想是使人这个物种有别于其他物种的要素，或者说，人是一种能思想和有思想的动物，而思想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其奥秘就在于思想是可以积累的。其他的物种都没有思想的积累，所以每一代都只能简单地重复他们前一代的活动，那只是自然的或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惟其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人的知识才是可以积累的，每一代人才有可能利用此前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每一代都比前人来得更加高明（或者更为恶劣）。自然史本身虽然也各有变化，但是并没有进步之可言。因为是有了思想，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而且确实在不断地进步和创新”。<sup>②</sup> 的确，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产物，具有理性特征，具有积累性，即思想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文明是如此，思想家自身也是如此，所以，思想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有思想史出现。

## 思想史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原本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涵盖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和学术主体心理等多个方面。但作为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一种普遍性的学术原则、一种模拟、一种多维的“看的方式”，已被不断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作为一种学术思维维度，范式的内涵是丰富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范式的本质》一文中将其归结为 21 种不同方面，能够适用于社

<sup>①</sup>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

<sup>②</sup> 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2—103 页。

会科学领域的至少以下诸多方面，可指一个科学成就、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一种公认的模式，一种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规范的评说，一幅“格式塔”图等等。<sup>①</sup>

无论是思想，还是观念，既有传承的一面，因而形成史，也有断裂的一面，因而有了“观念的单元”的说法。比如关于言论出版自由，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出，只有通过言论出版公开，才能保证人们真正获得真理。他说：“把真理和虚伪放在一起，通过自由的公开讨论，有谁见过真理失败了呢？”1859年，密尔发表了《论自由》，他在文中运用了弥尔顿压抑言论自由就是压抑真理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被压抑的见解是真理，就剥夺了人们获得真理的机会，即使被压抑的是虚伪的见解，也剥夺了人们通过真实与虚伪对抗，达到更加了解真实的机会。虽然如此，密尔和弥尔顿的“自由观”从其内涵来说，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弥尔顿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基督宗教天赋人权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因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灵性，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而密尔的自由观则是建立在政治与道德的价值观上的，所以他主张应有真正宽容的公众舆论，认为这才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自由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因循守旧、气量狭窄的公众舆论。弥尔顿和密尔的区别向我们显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

这样就形成了思想史的基本范式：其一是关注思想与观念的流变，其二则是关注产生流变的时代因素，即语境的影响，其三是特定语境下的思想特质。

“语境”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思想史的考察具有积极的定义，对此，英国著名思想家昆廷·斯金纳说：“思想史家能够帮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义，在所要求的新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sup>②</sup>斯金纳实际上很精辟地概括了思想史的价值和在不同时代思想史被不断重写的原因。

欧洲思想史从古希腊至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从古代的自然本

① 伊·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② 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1页。

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另一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而在这后一次大转向中又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向人类存在本身，一般称为“人类学转向”；另一种则是转向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学术界常称为“语言学转向”。

西方哲学从最初思考自然和人存在的根据，到思考人自身的认识活动与认识能力，从而形成人学哲学，当叔本华提出人的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的表象则是世界的诸多现象，并激起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分别从人、人的生命、生命的绵延来探讨世界的本原时，从而形成了欧洲哲学的“人类学转向。”

在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转向的过程中，哲学的语言学运用失误被提出来，进而胡塞尔等人发现了语言学比心理学在哲学中更加重要，再进而就有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以及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的边界也就是人的世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学转向”。

此后的哲学阐释学、符号学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后分析哲学，乃至种种科学哲学，都以语言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甚至以人学为主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等，也都关注起语言问题，并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尤其是现代哲学兴起以后，从语言、话语、对话、交往等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成为一种新趋向，“语方学”问题就成了后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这就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后现代成果。

观念史有观念史的范式。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提出对观念史的三原则，应该是所有思想史论者都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一，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历史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去追溯历史学家离析出来的每一个单元——观念。他认为，有些领域被人们认为与观念史研究无关，然而实际上它与观念史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二，观念史的研究不宜采取按国别、种族或语言来划分的方式进行，而应该按照一定的时代，或者该时代中的某些群体的划分来进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英国观念史，也没有什么法国观念史，国别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观念变化主要还是时代的影响。在他看来，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

第三，观念史研究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去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

响中的变化得以产生之过程的心理学特征。<sup>①</sup>

应该说,思想史的撰写有多种体例,但都有一个基本范式:观念的形成,范畴的流变,逻辑结构的分析,社会历史背景的简介,学说思想的渊源,大多是一种科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分析,而其基础是对历代思想家原著的解读。这也是本著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方法。

## 欧洲传播思想的界定

“传播学”(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美国,但传播作为一种观念却源于欧洲。Communication(Kommunikation/kommunikacija)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ctio/communcare”,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于口语,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该词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使之成为一个概念和范畴,汉语一般译为“交往”。<sup>②</sup>不仅如此,欧洲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几乎伴随着欧洲学术的诞生就有了。在欧洲的早期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以及近代的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到传播问题。

欧洲是人类传播研究的发祥地。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说服的学问,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论——“对所有可能的说服方法的研究”,虽然修辞术常常被认为是宣传艺术、政治艺术和法庭艺术;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信息传递的学问,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交往的学问,最早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

西方文化有两大传统,即古希腊文化传统和古希伯来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既是文化的,也是宗教的,也是历史的。就历史而言,正如汤普逊所说:“我们所有的历史著作和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完全建立在希腊人奠定的基础上。”<sup>③</sup>本书中有较多的篇幅谈到宗教的历史,原因在于宗教在较多时期是传播思想产生的动力。事实上,欧洲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思想革命都有宗教动力背景。虽然宗教革命是一场既是神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论争,但也成为产生西方各时代思想的根源,不过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正如施拉姆他们所说:“英国的清教徒拿圣经作为权威来反抗教会的权势,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这样做是在鼓励每个人自己做出判断的习惯。宗教上的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引导到宗派主义、有神论和

<sup>①</sup> 参见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

<sup>②</sup> 参见曹卫东:“Communication(交往)”,《读书》,1995年第2期,第118页。

<sup>③</sup>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

世俗主义。宗教革命也带来了一种和当代相适应的论辩方式，而由于宗教和政治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论辩方式很自然地就转用到纯粹世俗的领域中去了。”<sup>①</sup>

欧洲的思想者们虽然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中大量涉及我们所说的传播问题，但极少像麦奎尔那样专门研究传播问题。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将他们的学说置于这里所说的传播思想史中，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难点，但这种探索与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在以下的叙述中，进入视野的并非是一种断定，而应是一种预感。

传播学对不同传播活动及意义的研究，同社会学展开的有关课题彼此接近，因为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传播也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特点，从传播与政府、政党、行政部门、宗教和家庭等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更容易认识不同的传播活动和传播媒介的意义。

贯穿于西方传播思想的核心要素是“信息的交流”，如此传播思想史也就是人类对信息传播的观念表述的历史描述。它至少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信息的交流”的本体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交往、语言、符号、理解等；其二是影响“信息交流”的要素部分，这一部分包括影响交往与理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施拉姆说：“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sup>②</sup>这对于传播学其实并非好事，这让我们同时想起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曾说过的话：“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乃是在玩一种冒险的游戏。”<sup>③</sup>传播学包括着符号学，所以传播学在冒更大的险。本书将接受更大的考验与诘问。事实上传播学也将接受更大的考验与诘问。

人们习惯将欧洲现代传播理论称为批判理论。欧洲批判理论又可粗略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视野、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但事实上，在“20世纪欧洲传播思想”这一研究预设当中，直接或间接提供传播学思想资源的来自于不同身份的人文科学家，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等，远远超出了以上所说的三大流派。

<sup>①</sup> 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7—48页。

<sup>②</sup>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sup>③</sup>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观点可以概括地称为“媒介批判理论”。他们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身份,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为依傍,并具体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来整合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定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产生了异化,造成了“单面社会”和“单面人”,文化(艺术)也被商品化,形成了“文化工业”,即统治阶级操纵了文化传播媒介,使之成为一种工业,用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麻痹和控制群众,使人们对社会现实丧失了批判的要求和能力,因而人也就丧失了人性,而要改变这一切,就要寻求恢复人性、改造社会、解放人类的道路。虽然他们的理趣在于哲学、社会学范畴,同时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文本的文化分析,以及在大众文化和传播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受众接受研究等结合起来,却着实建立了欧洲传播理论的范式。

“文化研究”是指起源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学术成果,即后来的“伯明翰学派”。该派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横跨传媒研究、文学研究、交流研究、文化社会学、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学科,研究方向由最初的文学研究转向后来的社会学、人类学和人种学。自 7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趣从原来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转到意识形态、权力、性别、种族及族群等问题。目前的热门话题包括文化身份认同及文化表现等方面的理论问题。

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等接受了意大利葛兰西的影响,以 50、60 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70 年代盛行的媒体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 80 年代以来的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积极致力于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边缘群体与主导阶级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张扬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众争夺文化支配权的斗争,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欧洲批判学派的两翼。霍尔说过,文化研究使人认识到,媒体在构造和形成它们的反映的事物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并非有一个“外在的”(outthere)世界自由自在地存在于再现话语之外,“外在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文化的社会构成作用也可以表现为文化霸权作用,它塑造了人们对社会现实(如阶级结构、性别划分、种族结构)的话语,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认可当下的社会现实状况。所以霍尔说,“一套社会关系显然需要维护其(合法)地位的意义和框架”。文化研究学派对于当代传播思想最重要的是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尝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存在的条件。他提出三种不同的解